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二部 (下)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
杜书瀛 钱竞 主编 旷新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本书对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叙述，在文艺学学术史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全书以20世纪作为历史的坐标，以传统文论作为前史背景，并突出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现代转型的重大主题，明确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本书作为一种历史叙述，以问题为纲，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内史与外史结合，从学术问题的变迁到学术范型的转换，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影响的观照到对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清理，本书有效地将发生在20世纪文艺学研究中纷纭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和观点汇成历史的长河。本书既是集体编撰的结晶，亦保留了明显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为完善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二部（下）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杜书瀛 钱竞 主编
旷新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文学观念的演化	(1)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2)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文学	(7)
第三节 人的文学	(12)
第四节 进化的文学	(17)
第二章 文学的定义	(22)
第一节 文学的定义	(22)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建制	(39)
第三章 文学的重新定义	(51)
第一节 “文化批判”	(51)
第二节 文学的重新定义	(60)
第三节 “党的文学”	(72)
第四章 现实主义	(85)
第一节 写实主义	(87)
第二节 新写实主义	(94)
第三节 现实主义	(106)
第五章 文学的本质与功能	(118)
第一节 梁实秋：文艺道德论	(118)
第二节 朱光潜：文艺审美论	(131)
第三节 蔡仪：文艺认识论	(135)

第六章 大众化与民族化	(144)
第一节 文艺大众化	(144)
第二节 “民族形式”	(155)
第七章 新诗理论建设	(165)
第一节 诗体的大解放	(165)
第二节 格律的探索	(171)
第三节 纯诗的追求	(176)
第四节 新诗现代化	(182)
第八章 毛泽东文艺思想	(193)
第一节 “工农兵文艺”	(193)
第二节 文艺与政治	(202)
第九章 胡风文艺思想	(212)
第一节 “感性的活动”	(213)
第二节 “主观精神”	(231)
第三节 胡风与新文学传统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49)

第一章 现代文学观念的演化

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生，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以至根本性的变化。文学革命推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建立了新的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性质、范畴，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有人将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所发生的变革概括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且将文学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动力和发展的目标。

文学革命也被称为新文学运动。文学革命的爆发使中国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库恩所说的“革命”，是知识典范的转变。文学革命的发生使中国文学摧毁了古典文学的旧典范，创造了现代文学的新典范。古典文学的成规和价值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而新的文学形式和价值观念则从西方加以引进。中国文学经过与此前的古典文学深刻的、有意识的决裂，从此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而，“五四”文学观念的革新并不能局限于文学自身的解释，它与整个社会的变革是一个配套的过程，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与“五四”时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相联系在一起的，是互相适应的。

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发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开端。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如“不用典”、“不讲对仗”、“务去烂调套语”等。紧接着在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响应胡适的主张，并且将“文学改良”表述为“文学革命”。陈独秀将文学革命概括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所提出的口号成为后来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概念和范畴。钱玄

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也起来响应胡适的主张。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明确提出扫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文学革命”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它形成了新的文学知识，创造了新的文学视景。与漫长的传统的古典文学相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创立了新文学和新的文艺学，中国文学和文艺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文学在与古典文学的断裂和对立中张开了一个新的历史创造的空间，我们所谓现代文学就是以新文学为基本构架的，它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核心内容，现代文艺学才有了新面貌。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学是在现代化叙事的支配之下发展演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学与中国现代化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文学以复杂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化叙事的构造。现代文学独立的吁求，参与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合理分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将审美凸现于现代文学价值的中心；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文学又并非是单纯地属于“纯粹艺术”的，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替代传统经学承担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构成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是现代的纯文学观念的建立，另一方面却是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突出与强化。因为现代文学本身积极地参与了现代知识的规划和现代价值的构造，而不是相反，作为一种知识分化的结果，文学在现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担负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即价值意义重构的作用。或者如吴宓所说的，现代的文学批评“非仅如前人之诗话艺谈、零篇断句，自述其涵咏之心得，以为专门研究此道之人说法者。……盖今之文学批评，实即古人所谓义理之学也”^①。

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学”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中国经过不断的重新诠释，从而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在现代，经过了不断重新诠释的“文学”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现代的思想、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在现代中国，文学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

^① 吴宓《浪漫的与古典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27年9月28日。

自主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又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学发生在中国传统文明处于深刻危机的时刻，中国传统知识处于危机和不断崩溃的时刻。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学的发生不仅单纯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的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学的变化并不是自主地、内在地发生的，而是相关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它首先正是因为非文学的外在力量的推动，并且，它的革新运动往往都是非文学领域之内的社会政治实践者和思想启蒙者所发动的。并非是文学内在的动力在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变革，晚清文学革新运动，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运动都是由于社会政治的需要、新的知识的吸引和新的媒体所引起的变革，并且政治的变革成为了现代文学和文艺学变革最重要、最活跃的推动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有力地参与了文学，文学也有力地参与了政治；政治深刻地改变了文学，文学也深刻地改变了政治。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地位的上升，正是因为文学承担了广泛的非文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结合，从晚清的提倡政治小说开始，使文学的地位迅速地中心化。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先驱，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政治跨入文学，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历史沟通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与广阔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功利主义文学观。与此同时，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启超的启蒙理性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而得以凸现，它与梁启超启蒙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形成了一种矛盾和张力。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构成了现代文学思想的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80年代，由于文学自主和文学独立的要求，王国维的纯文学思想被认为是现代的和正确的，并且对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否定性的评价和非难。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割裂开来，否定梁启超文学思想的现代性。恰恰相反，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的开辟者，他引起了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深刻变革。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同时，文学是作为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只有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

背景之中,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文学和文艺学本身。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传统中国的大门,这是中国“千古未有之奇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如此,它也推动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古老的“天下”失败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也因此产生了相应的危机。夷/夏之辩,已经转变为东/西之辩,并且这种东方/西方的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传统/现代的对立和时间上的差异。中国失落了世界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改变中国”开始成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中心主题,成为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思考的中心。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正是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而展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深层地基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的变革是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变化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学发生的过程是中国现代知识不断的调整过程。在清初,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转移了当代知识的重心,使知识的形态从理学转变为经学。然而,随着经学本身的发展,经学内部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经世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清代知识的发展和变化,用艾尔曼一个简单的描述是,“从哲学到语文学”。在朴学这样一种知识的建制中,文学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非实证的知识,文学的地位是受到排斥和轻视的。经学不仅处于一种中心的地位,而且对于文学的知识形成了一种压抑。著名桐城派古文家方苞企图师从戴震,然而却遭到了戴震的拒绝和轻侮。戴震曾经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至于文章,等而末者也。”^①作为一种知识,文学绝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有它的完整的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配置。文学在作为一种知识受到了实证的知识的轻视和贬低的同时,它也受到支配性的考证知识的支配和渗透,实证的知识制约和规范着当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认识。王国维指出:“自我朝考据学盛,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②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也不断地被从清代的文学中排除出去,只有在今文经学兴起,考据之学受到冲击,想象力才重新受到推崇和重视,文学的地位也才开始上升。而这时整个旧的知识面临崩坏,新的知识即将产生,也就是说,正处于一种知识典范的转移

①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文集》,第 144 页,中华书局,1980。

②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第 58 页,《王国维遗书》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和革命过程之中。由于社会政治的危机,知识的形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纯粹的知识之学不断崩落,新的经世之学重新崛起。在晚清,西北地理、漕运等问题的凸现,以及魏源等人对于西方知识的最初关心,《经世文编》的编辑,说明一种知识的产生都有它客观的需要和根据。从魏源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兴起,都是对于危机的一种最初的反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出了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要求。只有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知识分子才将变革的方向转向思想文化的层面,尤其瞩目于文学。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说:“由来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①朱希祖说:“夫文学可以操纵人心,感化不觉,一利一弊,出入至巨,故其权能为最高。”他认为,诗歌、戏剧、小说“此三者为天下至可娱乐之品,文学家据此,得以最浅近之语言输最高美之情感,此可以鼓动一世而为感化大同之利器也。”他认为,俄国革命,托尔斯泰为原动力。其力可以震撼大地,操纵人类。^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③傅斯年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④

茅盾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说:“中国自有文学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说:“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自来新思潮的宣传,没有不靠文学家做先锋呀!”“文学是为表现人生面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旧文学家的著作,是一个人‘寄慨写意’的,是出于作者一时的‘感想’的,新文学家刚巧相反;旧文学家是主观的,是为己的,是限于一阶级的,新文学家刚巧相反;旧文学家的著作,也许是为名,是追附古人的,新文学家刚巧相反;还有旧文学家是有了文学上的研究就可以动笔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

② 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③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④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的，新文学家却非研究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办法。”^①

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说：“要说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攻击现制度，而欲以此说服众人，达到社会改造底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必得从感情方面着手。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的这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甚么事来。因此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的感情，激刺大众的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②

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要将文学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造的工具。胡适对于大团圆的批判，对于悲剧观念的推崇，实际上都是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作用，也就是说浸透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胡适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多，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胡适的悲剧观念是明确地和启蒙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是和他的启蒙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对于文学的重视是他对于文学的社会效果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他要用文学来做唤醒社会大众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和这种文学的功利主义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无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要说一点病都没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

① 佩韦《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920年1月）。

② 西谛《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

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①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并不能单纯地从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化中求得解释，它必须从整个知识秩序的改变中才能获得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首先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政治、社会、思想变革的要求，是“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②当我们谈论所谓文学的现代化，当我们推崇“纯文学”，强调作为艺术的文学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它置回到现代性话语之中去。文学知识必须放到更大的知识范畴和知识背景之中去加以认识和说明，文学本身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必须首先作为文化的文学来加以认识。“五四”文学革命可以直接联系到1915年10月黄远庸在《甲寅》月刊上发表的与章士钊的通信。在信中，黄远庸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为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③现代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文学

刘禾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她说：“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

①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

②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③ 黄远庸《释言》，《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

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民族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利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二十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五四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正是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①

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鲁迅说,文艺是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现代文学构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双重主体:有关个人的叙事和民族国家的叙事,也就是有关个人的创造和民族国家的创造。文学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文学一方面创造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另一方面创造个人自我的想象和认同,也就是民族国家主体性和个人主体性的双重创造。安德森在《想象的社群》一书中指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并吸引这个读者群而有助于创造民族国家的团体。他说:“小说无声地、不断地渗入到真实当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共同体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②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最突出的目标是语言的变革,“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是和白话文运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学运动也被视为创造新的民族国家语言的文学运动,以白话文为凭借和媒介的新文学运动是一种话语的全面决裂和重新构造与组织。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③中国新文学,也就是说以白话文为媒介的中国现代文学,胡适把它称为“国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民族国家叙事的支配。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确立,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新中国”,一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它一直支配着中国现代的文化想象和中国现代的文学叙事。“五四”时期的国语文学的概念,随着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发生不断的衍生和变化,它后来铺张、展开和转变成为了“国民文学”、“民族文学”等不同的概念与形态,它也同样规约了后来“民族形式”的讨论。“国民文学”的观念是现代的产物,它是在与西方历史、西方文学的接触中生成的。正是在 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之下,

①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

② 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第 39 页,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1918 年 4 月)。

中国才产生了“国语”和“国语文学”的意识，形成了现代民族文学的观念。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创造，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殖民侵略的产物。现代白话文运动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相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种国语的想象，也就是对于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在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兴起，与此同时，形成了现代国语和以现代国语为共同理解媒介的国语文学。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及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国语的形成时说：“为了使商品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①这就是为什么和“五四”资产阶级市民运动的崛起相伴而產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被称为国语的文学，要求以白话文作为现代交流的媒介和写作的工具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借助于一种同质性的语言创造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现代国家，语言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联系的一种重要媒介。正是在这样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要求下，产生了普遍的国语的概念。实际上，自晚清以来，政府就一直在关注创造国语的问题。在宋元时期产生的白话文，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被称为“白话”或者“俗语”，而在“五四”时期则被突出地赋予了现代色彩。这是由于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所具有的一种接近于口头语言和更具有全民交际的普遍性所决定的。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创生、觉醒是几乎同时发生的。所谓“国语的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创造白话文的运动，或者一个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过程，而是同时也包含了一整套的现代目标、知识以及文化想象。胡适一直强调，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国语”的发生、成立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参照和理想的原型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开始就包含了民族国家的想象，并且生成了一套有关现代文学的知识，规范和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想象与阐释规则。

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里说：“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由古典——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人民出版社，1972。

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这一步进一步的变化,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和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不过现时种界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以前,这个最终的日的不能骤然达到,因此现时的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因此,他使用了“国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概念。他说:“我们现在的新文学运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西洋各国国语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字。”他说:“创作须有个性、……但要创作确是民族的文学,则于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同的美的特性。”然而同时,茅盾所谓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先行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创造。他说:“这些‘国粹文学’内所表见的中华国民性,我们不能承认是真的中华国民性;国民性的文学如今正在创造着!”^①茅盾还说:“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②

在现代的文学活动中,民族国家话语与个人主义话语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它们既是一种对立,同时又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它们既是一种不断争夺,同时又是一种共同扩张的关系。因此,民族国家话语与个人主义话语产生了极为复杂的表述策略,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表达空间。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通常地被视为一种压抑与被压抑、表达与反表达的关系。通常国家/个人、集体/个体被描述成为了一种互不相容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也就是说,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被描述成为一种纯粹对抗、压抑和否定的关系。然而,实际上,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个人是同时建立起来和相互得到肯定的,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既是一种互相否定、对抗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相互建构、展开的过程。这样一种对立关系既是互相肯定又是互相否定,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和个人解放的话语被描述为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的;然而,实际上个人和国家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民族国家主义话语恰恰必须以个人主义话语作为它表达的策略和方式。

① 郎损《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

② 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在中国，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概念都是随着西方的扩张而产生的。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主义和“群”的观念在晚清的知识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国家/国民的概念得以明显地凸现出来。而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人的解放”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的词语。在晚清，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威胁，必须组成“国家”与强大的西方列强相对抗。然而，随着民族国家主义话语逻辑的展开，国家必须由个人组成。正是由于晚清“国家的发现”，造成了“五四”进一步的“个人的发现”；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产生了个人建设的需要。在“五四”时期，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对于家庭的破坏，要求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然而，实际上，现代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结构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使人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和作为同质性的个体去参与民族国家的构成，其结果，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基本成员，而是作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存在。也就是说，现代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实际上迂回前进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个人的控制。国家把个人从家庭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将之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对家庭结构的破坏是为了建立更大的和更有力的国家结构。国家对于家庭和家族的破坏是为了建立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为了使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更为密切无间的联系。因此，在现代，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于个人、个性的极力张扬，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成为了现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网络。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认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的民族，而中国民族则受到家族的束缚。陈独秀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①。然而，现代性是双面雅努斯，现代性的内部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当国家以“解放”的名义使个人摆脱了家庭和家族制度的束缚的时候，正是为了将个人组织到现代的国家之中去。国家将个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其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完成对于个人的直接控制和有效管理，将个人直接置于国家的管理与控制之下。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是将权力不断地集中到国家。

如果仅仅从表层的叙述和表达来看，《青年杂志》时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从民族国家主义话语到个人主义话语的转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知识界是如何从民族国家主义话语转变到个人主义话语的。“五四”时期有关个人主义的讨论很明显地是从晚清有关国家主义的讨论转变而来，个人主义的话语是由民族国家主义的话语而展开的，个人解放是从富国强兵转变而来的，个人主义的讨论无法脱离有关民族国家主义的规划。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说：“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他说：“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① 高一涵指出：“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自由、权利、国家，均非人生之归宿。”^② 易白沙指出：“救国必先有我。”^③ 因此，在“五四”时期对于个人主义的讨论中，一直无法脱离对于国家的表述。

第三节 人的文学

文学革命在最初看来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是以反对旧礼教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在最初，新文学的提倡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讨论的主要是语言的问题和文学的具体的形式问题，关于新文学的建设并没有真正明确地提出有力的口号，直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发表，新文学的创造才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规范。“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在“五四”时期，具有明显的典范革命的意义，它为新文学的创造初步树立起了思想理论的纲领，引起了文坛普遍的重视和呼应。“人的文学”建构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胡适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文学革命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里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被胡适认为是文学革命理论的一面旗帜。他系统地表述了欧洲 19 世纪现实主

①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号（1915 年 10 月）。

②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1915 年 12 月）。

③ 易白沙《我》，《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5 号（1916 年 1 月）。